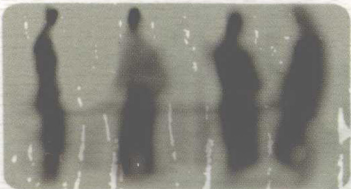




A History of
Media Culture



传媒文化史

一部大众话语表达的变奏曲

李 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 History of
Media Culture

传媒文化史

一部大众话语表达的变奏曲



李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媒文化史:一部大众话语表达的变奏曲/李军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 - 7 - 301 - 20841 - 0

I. ①传… II. ①李… III. ①传播媒介 - 文化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G219.2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2348 号

书 名: 传媒文化史——一部大众话语表达的变奏曲

著作责任者: 李 军 著

责任编辑: 谢佳丽(xiejiali.com@hotmail.com)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0841 - 0/G · 34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285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Contents

绪言	(1)
第一章 语言的契约	(8)
1. 非洲的稀树草原	(8)
2. 非说不可的地步	(15)
3. 物莫非指	(24)
4. 约定俗成	(33)
第二章 话语的权力	(42)
1. 媒介与权力	(42)
2. 话语精英	(50)
3. 中国历史的纪元	(58)
4. 平等的交流	(69)
第三章 文字的特权	(78)
1. 从图画到字母	(78)
2. 戛然而止的故事	(86)
3. 书写的材料	(95)
4. 舞文弄墨的精英	(102)
第四章 印刷的革命	(111)
1. 汉字与印刷术	(111)
2. 活字的命运	(117)
3. 谷登堡革命	(126)
4. 大众的读者	(132)
5. 出版的自由	(141)

第五章 公共的领域	(152)
1. 林中空地	(152)
2. 千呼万应的喉舌	(160)
3. 宪政的权利	(170)
4. 理想与现实	(177)
第六章 声像的传播	(191)
1. 穿越时空的电波	(191)
2. 面向大众的电视	(203)
3. 电视与娱乐	(212)
4. 收视率魔咒	(218)
5. 媒体的公共使命	(224)
第七章 网络的时代	(231)
1. 媒介形式的终结	(231)
2. 网络的极化	(241)
3. 网络与民主	(250)
4. 文化的兴衰	(257)
5. 自由与规制	(263)
第八章 伟大的基业	(268)
1. 外来的新鲜空气	(268)
2. 众说纷纭的时代	(278)
3. 言论的权利	(284)
4. 我手写我口	(288)
5. 千秋的功业	(294)
余论	(303)
参考书目	(307)
后记	(320)

绪 言

每一个时代都有占据支配地位的媒介交流方式。其中,最为人熟悉的就语言。语言是人类至今为止最古老、最伟大的发明。在人类学会钻木取火和打制石器之前,就已经掌握了这种媒介。人的言语通过声波的传递,在两个互不相连的神经系统之间搭建起无形的桥梁,让一个人的思想进入另一个人的大脑,并引起相应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反应,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得以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形成生活的共同体。

语言是言语者之间的公共规约,“这些规约必须被社会集团所采纳,并允许个人付诸实施”^①。这赋予了分享这个语言惯例系统的人群——语言学家称之为“语言社团”——每一个成员相对平等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不计贫贱,无论富贵,成为人人拥有的天赋权利。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语言表达的机会远非均等,历代帝王与权贵总是煞费苦心将自己的言语罩上神秘或神圣的光环,但依然无法剥夺大众与生俱来唯一属于自己的传播媒介。

美中不足的是,语言无法在时空中停留。千百年来,多少款款细语,奈何随风飘散;无数凿凿言辞,难免转瞬即逝。唯有将无形的声音化为有形的字符,才能够跨越时空的阻隔,让不朽的声波镌刻在永不磨灭的彩陶与龟甲之上。于是,人类开启了“文铭”传播的时代,文字让言语流传,让思想永存,让记忆长留,让知识累积,所有体现人类精神特质的“文明”、“文化”、“文学”、“文艺”、“文献”、“文章”都离不开“文字”的铸就。

然而,文字也筑起了人类媒介传播的第一道关卡,打开了媒介话语壑

^①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断的第一道大门。在文字出现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由于社会精英话语特权的需要,也由于文字“书写”工具和材料的极度稀缺,大众对于文字“新媒体”的掌握和使用难度极大。文字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但文字与语言却成为两种相对独立、甚至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无形中在大众与精英之间设立了一道巨大的文化鸿沟。

这道鸿沟直到中国人发明了纸张、雕版印刷以及活字印刷之后才得以稍稍填补。就此而言,我们的祖先对于大众媒介传播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遗憾的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普及和推广,直到晚清中国图书仍以雕版和抄本为主。而西方社会自从15世纪中叶谷登堡印刷革命之后便在活字印刷方面一路领先,加上西方表音文字本身的印刷传播优势,引发了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民主运动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在文化与政治诸多领域里推动了大众话语表达。

随后的媒介演进史,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缤纷缭乱的图景。从报刊到杂志、从电报到电话、从摄影到电影、从广播到电视,在大约五百年的时间里纷纷亮相,林林总总、精彩纷呈,它们与语言、文字一起,构成了人类传媒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在这个被称为大众传媒的时代,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大众接收信息的能力与传播信息的能力之间呈现出一种剪刀差式的变化趋势。一方面,大众传播从文字(报刊)到声音(广播)再到图像(电视)的演进方式,使人类听觉与视觉器官回归到最初的言语与识图状态,从而为普通大众大幅度提高信息接收能力铺平了道路,大众信息接收能力的提高又反过来助推了媒介对大众的全方位信息覆盖,在大众信息接收能力与大众媒介传播之间形成了持续不断的正反馈。另一方面,现代大众媒介的技术性条件、规范性管制、集中化经营以及不断提高的入门门槛,使得普通大众利用“大众传媒”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困难。

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交流方式,也正在改变大众媒介传播和话语表达的能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的面孔从来就是毫无表情的,因而从来就是“客观中立”的。随着数字化传媒

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媒介表达的渴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现可能,大众对于“传播”与“被传播”的鉴别也开始逐步明晰。虽然现在无法完全预测这种发展趋势会带领人们走到多远,但未来真正“大众的传播”这一总体趋势值得寄予厚望。

今天的世界已经毫无保留地被各式各样的传播媒介所包围、所投射、所塑造、所解析,甚至所解构。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里:一个是物理的生活空间,另一个是传媒的信息空间。传媒的魅力就在于它常常能够让人混淆两个空间的差异,误将传媒提供的认知空间等同于真实的生活空间。尤其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介传播时刻为我们提供着“世界上”和“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谈资,人们津津乐道地复述、分析和散布着媒介提供的各种信息,自信满满于“足不出户”而能够“尽知”天下大事。正如李普曼所说:“毫无疑问,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①也许,媒介的确正在不断“虚构”着一个信息的世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虚构”搭建了一座连接“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间的桥梁,并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一扇又一扇超越直接经验的信息窗口,导入到一个极其庞大且又光怪陆离的拟态环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突破现实生活的狭隘限制,设定了面对大千世界的认知地图与航行坐标。

审视传媒历史上一幕幕潮涨潮落、云卷云舒的媒介技术景观,会发现存在着两条相互交织的发展线索:一条线索是媒介自身的发展史,从语言、文字、书籍、报刊、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持续演进,汇成了一条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推动传播发展的历史长河;与此同时,另一条线索是人类传播活动的文化史,身处不同传媒时代的人们,运用媒介传播技术,参与社会传播交流,争取媒介话语权利,构成了一幅社会传播文化色彩绚丽的恢弘画卷。

当我们把上述两者放在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审视的时候,我们可

① [美]李普曼《公共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2页。

以清晰地看到,传播史既是媒介发展史,更是人类与媒介关系的文化史;既是媒介全方位影响人的认知、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也是人们发明媒介、掌握媒介、使用媒介以及争取媒介话语权的历史。总之,媒介传播史就是媒介演进史与人类传播文化史的有机结合,在不同的传媒时代,演绎出一系列饶有趣味的文化命题,其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本书所关注的有关媒介技术变革如何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话语表达权利。

从总体上说,人类传媒发展历程是一个传播媒介从社会精英向社会大众不断延伸的过程。按照一般传播史四个阶段之说,第一阶段是口语传播阶段,也就是语言作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时代,在这个阶段,全体大众是语言的共同发明者、使用者和传播者,语言媒介的交流能力为每一个人所拥有,大众的言语表达成为日常生活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二阶段是文字传播阶段,起始于文字发明以后的传播时代,在这个阶段,书面文字传播从日常生活传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性传播的主要载体,用作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文字传播以及各种书写材料被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所垄断,或者珍藏在精致的“约柜”里,或者镌刻在高深的“国子监”石碑上,普通大众基本上被排斥在书面传播之外,充其量只是聆听文字宣读的被动受众。第三阶段是所谓的大众传播时代,它的最早起点以谷登堡的印刷革命为标志,以普通人为阅读对象的书籍大批量生产和发行,商业性的书籍和报刊经营成为社会上的一种重要行业,特别是定期报刊的出现意味着固定大众传播消费群的形成,随后的广播、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更是将所有大众纳入媒介辐射和覆盖的领域内,媒介受众的全民化时代到来了。第四阶段便是互联网传播时代,在这个阶段,由于电子传播技术的惊人发展,实现了人与人之间超越时间、空间的点对点、点对面、面对点、面对面的互动式传播,计算机网络以及个人电子通讯设备的快速普及,使得普通大众继遥远的口语传播时代结束后第一次重新拥有参与社会性传播的媒介资源和媒介素养,大众在网络媒介传播中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也能成为主动的信息发布者,并且这些信息有可能成为影响精英决策和社会生活的传播力量。

如果我们以历史的时间进程作为横向坐标,以大众主体直接参与社会性传播的程度作为纵向坐标,在这个坐标系中大致可以勾勒出一条“大众的传播”的历史轨迹。这是一条U型的曲线,它的两端分别是人类传播的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中间部分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U型的底部大致是在谷登堡革命的前夜,此时文字的垄断达到了极致,而大众参与传播的能力与机会处于历史的最低谷。在活字印刷的有力推动下,借助“大众传播”技术飞速发展之力,“大众的传播”曲线一路上行,并在网络传播时代进入一个新的境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大众作为传播主体参与社会传播的基本趋势正在不可逆转地向前跃进,没有任何戒律、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最多只有暂时的顿挫或延缓。

传播媒介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延伸、自我的超越,更是话语的嬗变、治理的变革。语言的运用,使口头传播取代肢体动作,成为信息沟通的主要途径,从此人类社会治理从肢体权力进入话语权力的时代;文字的出现,为话语权力的维系和传承提供了历时的凭证,并使传统叙事和经典文本的阐释成为精英统治权力的护卫力量;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书籍的传播,逐渐打破了权力精英的文化垄断,极大地推动了大众话语权利的复兴;报刊的出现和普及,为大众的媒介政治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并使传播媒介在“看门狗”或“把关人”的角色颌颔中承担起民主舆论的政治功能;广播和录音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话语交流突破时空的阈限,在使受众接受来自上空权力回音的同时,也扩大了民众的话语表达;随着影视时代的来临,人类视听感官联袂“王者归来”,在大众传媒的时空背景下将“政治传播”演绎为“传播政治”;互联网与多媒体技术在致力于所谓“媒体整合”的同时,也实现了人类传播感官的整合,同时使信息传播的“主体”与“客体”实现超越时空的即时互动和角色转化,并将人类治理推进到所谓的“电子民主”的时代,既给“大众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也给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参与带来新的挑战。总体上说,在整个发展历程中,传播技术的演进与大众话语权利的扩大是携手共进的,“大众传播”名义下的“受众传播”时代正在向真正意义上“大众的传播”时代迈进。

对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过程展开一次寻幽探蹊的学术之旅,无疑是精神上的巨大享受。这种享受不仅来源于传播学本身的魅力,更源自于一种跨越学科疆界的文化驰骋。正如隆·莱博所说,“把文化研究设想成为一种单一的范式是最困难的,因为它的起源本身就是跨学科的,而且分析人员必须选择的文化现象也是十分宽泛的”^①。事实上,人类传播的过程从古到今都是超越文化和跨越国界的;同时,传播学与生俱来就是一种交叉学科。所以,我们的探索之旅既不囿限在某一时空领域,也不局限在某一学科范围,而是在中西方跨文化语境下交错展开。借用钱钟书的话来说:

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一门学科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②

于是,阅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在探索之旅上将会有一系列重要的传播学先驱人物与我们结伴而行,他们的名字至今仍镌刻在世界文化传播的方尖碑上,其中包括先秦诸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保罗、王弼、郭象、奥古斯丁、慧能、朱熹、洪堡特、马克思、恩格斯、索绪尔、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维纳、香农、李普曼、施拉姆、伊尼斯、麦克卢汉、波兹曼等,以及近年来风生水起般地聚集在文化传播学和政治传播学领域中头脑敏感的学术访客。他们的视野不尽相同,观点千差万别,却都在各自的历史境况下丰富了人类对于媒介交流的认识。每一次传播媒介的变革,无论是唤起以技术决定论为代表的媒介乐观论者的激赏与喝彩,还是引发以社会批判学派为代表的媒介悲观论者的忧虑

① [美]隆·莱博:《思考电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5页。

② 钱钟书:《诗可以怨》,载《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3页。

和伤怀,都从一定的角度折射出他们面对媒介传播大众化趋势的微妙心态。事实上,正是这个横亘于各种媒介社会理论面前的原点性命题,识别出各自的文化色彩和学理路标。

作为一部媒介传播史论,本书旨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梳理和勾勒出一条媒介演进与大众话语权变迁的关系曲线,特别是关注不同媒介时代精英话语权与大众话语权之间的此消彼长,以及传媒变迁对于民众争取话语表达的意义,尽量准确地呈现普通大众争取传播主体地位的不懈努力,希望发现传媒演进对于人类话语权嬗变的历史影响与政治意蕴,书写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传播”史。

在全书的最后章节里,还专门审视了中国近现代媒介话语的发展历程,重点讨论新文化运动对于大众传播普及的历史作用,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汉字简化、扫盲运动和推广普通话以及普及义务教育等方面居功至伟的传播业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历经百年基业铸就的中国传播文化,一定能够迎来大众媒介表达的新纪元。

从十万年前人类出现的那一关键时刻起,传播就是人类的心脏。

——罗伯特·W. 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

第一章 语言的契约

1. 非洲的稀树草原

语言是人类发明的第一种传播媒介,是人类一切传播媒介的基础,也是普通大众借以表达意愿的主要工具。正如萨丕尔所说:“除了正常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地表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①因此,演奏人类传媒的变奏曲,语言必然是最先弹奏的第一个最悦耳的音符。

要了解语言最初的形成与传播,着实是一件困难的事。可以想象,在幽静的山谷中,我们的先祖用模糊的音位表达细腻的感情;我们仿佛听到,在荒凉的原野上,我们的先祖用简单的音节呼唤放牧的归人。时光无情地侵蚀了千万年来茫茫大地上的人类足迹,更何况那远山的呼唤,那喃喃的细语,早已随风消逝。

优秀的古人类学家试图在零星的考古挖掘材料中,发现些许沧桑岁月残留下的人类早期生活的痕迹,拼凑出一幅我们远古祖先语言交流的残缺画面。然而,语言难以变成化石,声音不会留下碎片,就连那些主要由软骨和肌肉组成的发声器官,也已湮灭在滚滚风尘之中。于是,许多有关人类语言起源的解释不得不建立在假设和推理的基础之上,这使得那

① [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页。

些希望将语言学从一门技艺发展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家们深感泄气。甚至有些语言学家拒绝对语言的起源问题进行任何专门的研究,免得毫无意义地耗费时间。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就在章程中明确规定,拒斥一切语言起源的理论,禁止任何人在会议上讨论语言起源问题,认为这只会浪费时间。

简单的回避或拒斥并不见得是一种明智的态度。事实是,“语言的起源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对人类心灵有着不可思议的诱惑力”^①。人类自古就关注语言的来源,他们有的创造出各种神话,试图说明人类依靠神祇或先知获得了语言的能力;有的诉诸更加理性的思考与探究,来解释语音与语义之间的“名实”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论战中,甚至在其后两千年近代哲学家的论战中,都可以找出相应的例子”。^②索绪尔曾经提出过语言学的“三大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追究语系的历史”^③。既然语言学研究需要追本溯源,就应关注到人类所有语系的最初起源及其发展动力问题,这也涉及索绪尔规定的语言学另外一项使命,即“确定所有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④,这种力量难道不就是推动语言起源的动力吗?

对语言起源的探究不应成为语言学家的学术禁脔。事实上,正如房德里耶斯所言,“说语言的起源问题不是语言学方面的问题,总是会使人感到惊讶。但这确实是一句真话”^⑤。在历史上,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曾关注过这个问题。这是因为,语言是人类最先发明的一种传播媒介,它的出现可能“比物质文化的最低级发展还早”^⑥,当然比人类所有社会规则和社会制度更加悠久。语言是思维的基础,也是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基础,语言以及语言起源的研究,理应成为各种文化研究的前置议程。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② [丹麦]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页。

③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④ 同上。

⑤ [法]约瑟夫·房德里耶斯:《语言》,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页。

⑥ [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

语言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生存适应作用,研究语言的起源应该与研究人类的起源同步进行。令人欣慰的是,新近的考古发现和人类学研究成果,以及有关人类基因图谱的科学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人类语言起源的有益线索,这些线索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遥远的非洲中东部地区,那里很可能是人类祖先的发源地,也是人类最早发明语言的地方。

达尔文是最早提出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的科学家之一。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他用很小的篇幅提出了“人的出生地点”问题。他指出,自然界存在一种普遍的现象,“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大区域里,现今存在的各种哺乳动物和同区域之内已经灭绝了的一些物种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既然现存与人类关系最为近密的大猩猩和黑猩猩都生活在非洲,那么“有可能的是,在非洲从前还存在过几种和今天的大猩猩与黑猩猩有着近密关系而早就灭绝了的类人猿”,这些类人猿事实上就是人类的祖先,所以“比起别的大洲来,非洲似乎更有可能是我们早期祖先的原居地”^①。另外,达尔文还说,当人类最初失去体毛的时候,“他当时所居住的大概是个气温很热的地区”^②,这似乎也是对非洲的一种暗示。作为科学家,达尔文是非常严谨的,他坦言“在这个题目上多作臆测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毕竟“人和他的最近亲族之间这条链索中存在着一段大空白,而我们又没有任何灭绝了的或现今还存活的物种可以把它填上”^③。对此,我们完全理解达尔文科学审慎的态度,毕竟在距今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达尔文时代,人类进化的早期化石都还沉睡在大地之中。

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发现,人类物种起源过程的诸多“大空白”正被达尔文的后来者铢积寸累地填补着。大多数研究发现都倾向于支持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判断,尽管还有不少人坚信非洲并不是人类起源的唯一地点。在此不准备就人类“非洲起源说”和“多地起源说”展开辩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影响下面的讨论。

① [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2页。

② 同上书,第242—243页。

③ 同上。

关于人类起源,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所谓“人”这个物种的理解和界定。科学家们对此意见不尽一致,但大多数人都认同,两足行走是“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达尔文对“两足行走”的适应意义极为重视,他说:“只有人才变为真正地用两足来行走,而我认为我们从此可以部分理解到,他为什么终于取得了构成他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的直立的姿势。”^①今天,这一点已成为共识。当代著名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人类的起源》中甚至说:“两足行走的起源是如此有意义的适应,以致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所有两足行走的猿都是‘人’。”^②对于人类语言的发生,两足行走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土壤学家和人类家的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 1500 万年前,非洲从西到东覆盖着大片森林,居住着形形色色的灵长类,包括很多种类的猿、猴。在其后的几百万年里,“非洲大陆东部下面的地壳,沿着从红海经过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一线裂开”,形成了海拔 270 米以上的大高地,“隆起的高低使东部地面成为少雨的地区,丧失了森林生存的条件。连续的森林覆盖开始断裂成一片片的树林,形成一种片林、疏林和灌木地镶嵌的环境”。随后,大约在 1200 万年前,持续的地质构造力量产生了一条从北到南长而弯曲的大裂谷,“形成妨碍动物群东西交往的无法超越的屏障”^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需要一点想象力。法国古人类学家伊夫·柯盘斯,据说还有荷兰的古人类学家科特兰特,提出了一种极有趣味的假设,即这种东西走向的屏障是人、猿分道扬镳的关键性因素。“由于环境的力量,‘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群体本身就分开了”^④。这种地理隔断形成了生殖隔离机制,在不同进化力量的推动下发展出新的物种。在大裂谷的西部,人猿共同祖先的后裔致力于适应生活在湿润的树丛环境,其后便成为猿类,在衍生出若干中间物种之后,最后成为现代

① [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68 页。

② [美]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第 13 页。

③ 同上书,第 15 页。

④ 同上书,第 15—16 页。

的黑猩猩。在大裂谷的东部,为了适应开阔的新环境,人猿共同祖先的后裔开始了两足行走的新生活,其中之一经过许多中间阶段之后,终于演化为人类。

我们难以想见,面对气候变暖和原始森林成片消失的严酷环境,当时非洲大地上的人猿共同祖先经受着何等艰巨的挑战。他们多年来生于斯、长于斯,已经习惯于在高大的树枝之间四足攀爬。当他们不得不从树上走到地下,并且忍受炎热、干旱的考验,四处寻找食物的时候,这种前所未有的生态巨变,对于大多数灵长类来说,不啻一场灭顶之灾。

谢天谢地,我们要深深感谢自然进化在此之前赋予人类祖先的顽强适应能力。当参天大树的温馨居所终于好景不再,当浓荫蔽日的天然果园成为伤心记忆,一些灵长类从此消逝在枯木断枝之间。我们的祖先却没有像许多朝夕相望的同类们一样,而是挺直腰杆,昂首阔步地告别森林,走向广袤的稀树草原,迈向另一片开阔的生命天地。

人类语言起源的故事就这样从 700 万年前开始了。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是对人类生存能力的一场严峻的考验。最先遇到的问题就是食物来源的改变。离开了植物茂密的森林,原先取之不尽的浆果、坚果、根茎、叶瓣、种子等已难觅踪影,我们先人的食谱必须作重大的调整。幸运的是,此时人类的食性还没有特化,他们的消化系统可以应对饮食习惯的重大改变。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辽阔的非洲热带草原上,至少有三千多种动物与人类共同生活在这片蓝天之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各式动物为人类祖先餐饮结构的改变提供了机会与可能。然而,作为昔日的食草动物,旦夕之间要变成茹毛饮血的肉食性动物或者至少是杂食性动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是对肠胃的巨大挑战,更对人类大脑和四肢的捕获技能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毕竟人类祖先的生理结构和身体素质并不擅长于此。雪上加霜的是,周围时刻游荡着许多大型食肉动物,它们虎视眈眈地盯着这群新来的不速之客,人类孱弱的躯体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用今天生态学的术语来说,人类祖先当时正处在非洲